

書名：《牧齋初論集——詩文、生命、身後名》

作者：嚴志雄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4月

頁數：437頁

嚴志雄先生新著《牧齋初論集——詩文、生命、身後名》，是繼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Routledge, 2009) (此乃嚴先生1998年博士論文修訂而成，中譯本《錢謙益的“詩史”理論與實踐》將於今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臺灣“中研院”，2012)、《秋柳的世界——王士禎與清初詩壇側議》(香港大學出版社，2013)等之後的重要論著。若初步翻看諸作目錄，我們會很容易判斷新著僅為與錢謙益詩文相關的論文集，與之前幾部精心擘劃論述方法與規模的作品很不一樣。已故學者張暉(1977—2013)評論《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時已指出，嚴先生首兩部著作在結構上“存在著一些相似之處”，即從架構上先將理論框架和問題意識辨析清楚，開展具體的課題探討，然後聚焦到詩歌文本的細讀(close reading)，從而進入和理解詩人生命所面對不同境遇、關情與證悟。(《〈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的啟示意義》，《朝歌集》，2013年)若仔細辨察，二書又有分別：前者先釐清錢氏的“詩史”概念，繼而以詩歌文本對照參證；後者先分專題議論，確立組詩意義，再透過仔細的箋釋工夫辨析和深化各詩語詞背後的本事、意象和符碼，不單結構創新，也是一種論述方式的超越。這種相似與超越，反映嚴先生對論述理路和方法的深思熟慮，並非偶然。以此延伸照看，若我們將嚴先生四部作品視作更為宏大的論述結構安排，《牧齋初論集》雖似乎沒有自成緊密的體系，但結合前三者，則體現了嚴先生這些年來治學思路的層累，以及理論關懷的輻輳反映。

嚴先生著作的導論，往往能自成一篇文章架設獨立而帶有感情的理論展演，若細讀嚴先生四部論著的導讀，相信能領會箇中況味。《〈牧齋初論集〉導論》便是

從嚴先生自身的學習、思考,以至情感經驗出發,帶領讀者賞覽一遍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如何消解“作者”、以至於“人”的主體(Subject)意義,驅動我們掌握詩文背後的言意機制、符號指涉,甚或讀者(包括我們)參與的涵義發掘與詮解;進而探視語言系統之下,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 )對“自我”與“空間”的相互闡發和角力的論說,以及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社會學思想中,“社會空間”(social space)與“行動者”(agent)所共同營構的多維度的階級、位置、權力和關係,並反顧中國學術,比照、審視史家陳寅恪(1890—1969)對人際關係的考論思維與方法。先生在導讀中直言:

這是我寫牧齋的第三本書。與此前的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2009)、《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2012)不同,本書現在的整體面貌是漸次浮現的,非如前二書之先有整體構想,依次完成。也因如此,借這個機會,我在上面就“通過文本想象作者”、“通過‘關係’理解人”二大端對我過去的一些想法、思想資源及長期關心的課題作了一番反思、檢討,俾讀者知我心思之所在,並困惑之所在。

本書各篇的視角和向度多樣,但實際是以上述“二大端”貫穿其間,透過不同課題設計,以窺探、梳理、紬繹錢謙益詩文間的斷片與縫隙、生命中之情興與回憶,以及身後名的典律化與變易過程。

筆者認為,此“二大端”更可倍大映射嚴先生四部著作之格局,以把握當中的課題偏向,及嚴先生研治視野的稍移。在首二著,嚴先生進入錢謙益的個人生命史,尤其從錢氏晚年詩歌文本理解、想象或形塑當中所演示獨特的“詩史美學”和自我造像操作,比較偏向“通過文本想象作者”一端。與此同時,嚴先生關注明清詩人及其文字,在置於各種社會空間/“文化場域”(field of culture)之中的交涉互動,並由此產生的不同理解和認同,特別是“主體”的各種建構或位移、“權力”的不斷挪用或詮釋。是以《秋柳的世界》從王士禛《秋柳詩四首》作品本身及吟咏情境,披展到後續不同個體或社群的倡和、重作、接受和詮釋

等,在在反映如何“通過‘關係’理解人”的體悟與理論操演。至於《牧齋初論集》諸篇的課題選取和論述方法等,正是通過“文本”與“關係”兩種詮釋角度的貫徹實踐。如嚴先生說,本書“沒有整體構想”,若我們從書中九篇文章課題和標署的刊年看,乃大體按課題相關的時空排列(大抵自遠至近、先中國而後朝鮮),實際上可分三個大方向,茲列如下(為方便閱讀,省去刊載的學報或論文集名稱):

一、關於錢謙益與爭衡對象、愛欲對象及傳續對象的諸種企圖、互動與糾葛

第一章 《錢謙益攻排竟陵鍾、譚新議》(2004)

第二章 《情欲的詩學——錢謙益、柳如是〈東山酬和集〉窺探》(2009)

第三章 《哭泣的書——從錢謙益絳雲樓到錢曾述古堂》(2011)

第四章 《清初錢謙益、王士禎“代興”說再議》(2016)

二、錢謙益形象之“典律”過程及其詩文著作的接受史

第五章 《錢謙益遺著於清代的出版及“典律化”歷程》(2015)

第六章 《權力的意志：清高宗乾隆譏斥錢謙益詩文再議》(2017)

第七章 《近代上海〈申報〉中錢謙益的身影》(2017)

三、異國之於錢氏、錢氏之於異國的想象與建構

第八章 《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試論錢謙益之論次麗末東國史及詩》(2014)

第九章 《典午陽秋,休聽暇豫——朝鮮文士南九萬所述錢謙益詩考論》(2016)

本書為嚴先生探論錢謙益的第三部著作,但同時我們不可忽略在其間撰著《秋柳的世界》的重要性,以及與《牧齋初論集》的對照關係。先生深得西方漢學對於歷史、文學、藝術,以及社會史、經濟史、書籍史、閱讀史諸領域對話與調融的訓練,故往往能引入、調整或設計適切的論述框架,作為發揮文本細讀

的理想詮釋環境。在《秋柳的世界》中，梳析《秋柳詩》文本在各種場域中所牽動引發的接受和詮釋意義。而這些場域包括了抄本、書畫及匯刻等表現媒介，嚴先生亦因此順理成章地以這些媒介作為“手抄本文化”(manuscript culture)或“出版文化”(printing culture)的研究素材。此又與書籍史或閱讀史等史學理論工具息息相關。比諸《牧齋初論集》，第五、六、七章的課題視野實際也包含這些理論元素，雖然嚴先生沒有直接言明。

書籍史或閱讀史屬於“後現代史學”或“新文化史”的重要範疇，史家將目光聚焦到書籍的文本出產或閱讀過程，探究其在社會或文化場域底下的各種出版及流布型態。在這些書籍流傳過程中，文本、以至所謂“超附文本”(paratext)的諸般操作，以及其所反映的時代社會氛圍、權力宰制、市場心態和閱讀文化趣味等，帶來深具闡釋能力的史學視野。在“文學生產場域”(field of literary production)裏，諸種文本的開放與封閉，此間之相互指涉與對話，又或相隨而來的異文衍變和挪用等，都造成多維度的文本空間和釋讀意義。《牧齋初論集》第五、六、七章正展現錢謙益遺著出版之周折、乾隆帝對錢氏詩文或著作的刪抹與查禁，以至於晚清以來《申報》因應世變而對錢氏形象的多番操弄，尤其當中所涉及的文本挪用與解讀，皆非簡單以接受史所能涵蓋或詮釋。錢謙益形象和詩文在晚明以後的文學文化領域影響力巨大。他熱愛藏書，熱衷編撰著作、參與出版，不論生前或身後，親力親為還是被冒託其名，錢謙益都與書籍產業文化離不開關係。現在已有不少有關錢謙益與書商、出版等的相關研究，嚴先生此數篇文章則敞開了更為寬廣多樣的考察視角或畛域，讓我們深入研探。

最後，本書的眾篇文章也讓筆者想到古典文學理論批評的研究工作。事實上，嚴先生曾自言對這個範疇興趣不大，但其治學方法或能給予一些研究進路的啟示。過往我們放眼明清文學，除了小說、戲曲因時代性與獨特的藝術性而長期獲得關注外，文學理論批評也是此時期相當豐富的研究資源。我們知道，在文學批評史或詩學史的書寫方面，大多以朝代分期，據其中的重要流派、文學觀念、理論要籍或批評名家等作為坐標，從而梳理其整體趨勢。那麼古典文學理論批評的相關研究，其切入角度或研究方法大抵數種：或先考訂某理論

家的時代生平,再整理、闡發其著作或言說(某部詩文選集、詩話文話,以至零散的論說等)所反映的理論關懷或批評特色;或選定一種或數種文學觀念,然後爬梳、排列相關的文獻資料,以作大致的歸納與辨析;或結合當時的社會、藝術、宗教等文化思潮,貫通、生發當中的理論意義和價值。就以錢謙益的詩學觀念為例,一般我們可以舉出“虞山派”、“列朝詩集小傳”、“詩史”等關鍵詞,乃至若干詩文集序等,然後從文學史或文學批評史的宏大敘事格局,闡揚、建構其理論意義,突出價值與影響。這些研究貢獻巨大,影響深遠,實在不容忽視。但除非對文本具有深刻的洞察或理論思維的卓見,不然學術研究典範(paradigms)之大同小異,亦確實容易造成論述的陳陳相因。

隨着近年訊息逐漸流通、各地館藏古籍的陸續開放或數碼化等,不少文學理論批評文獻(尤其明清時期)獲得比較完善的校訂、整理和出版。譬如:陳廣宏、侯榮川編校《稀見明人詩話十六種》(全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張寅彭主編《清詩話三編》(全十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陳廣宏、龔宗傑編校《稀見明人文話二十種》(全十冊,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陳廣宏、侯榮川編校《明人詩話要籍彙編》(全十冊,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等,這些文獻的整理工作無疑為文學理論批評領域大大拓寬了研究的視野,我們可藉此重新審訂這些理論要籍的版本源流,或補充、重塑其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價值意義。與此同時,文獻的重新整理出版也驅使學者思考:在文獻重審或要籍補遺以外,是否還能作出學術範式的創新或轉移,從而充分掌握各種文獻或言說的語境特徵和意義。此如陳廣宏教授近年主張宋明詩學文獻的“近世性”特質,以此作為學術“前沿”,其探尋途徑之一是元明時期的出版與編集型態對詩學理論的流轉與接受,如《明代詩學研究中的文獻批判問題》(2018)、《明詩話還原研究與近世詩學重構的新路徑》(2018)等文章均作深入討論。此外,近年來西方關於印刷、閱讀、性別、區域、疾病等文化理論的不斷引入,也豐富了文學批評課題的詮釋面向。

《牧齋初論集》衆篇雖不是以錢謙益的詩學主張作為考察重點,但嚴先生對於詩文零片的擇取、細讀,並加以各種串連綴補,不單以此代入古人的生命語境,從而揣摩、整合其心思興懷,有時更給予錢氏詩文理論提供嶄新的詮釋

窗口。*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的“明遺民性詩學”與“詩史”等論說，固是成功的操演。而在《牧齋初論集》中，第一章透過“文化場域”對錢氏與竟陵派的關係辨析，以至於對《詩歸》的大力排擊，比起簡單的“竟陵”、“虞山”代起而出的陳述，更具闡釋力量；第四章對“錢、王代興”此詩學史成說的再議，要是沒有嚴先生深細地蒐集、比列錢氏的“代興”諸說，也無以辨析其真正的期盼、囑託的對象，反映“代興”之說背後各種話語表述的連繫與張力；又如第八章談錢氏論次高麗的史與詩，也涉及《列朝詩集》的選詩原則與機制，嚴先生沒有立即從詩學史的宏觀視野分析錢氏對高麗詩人詩作的處理，而是嘗試進入高麗末代宗統鬥爭與朝鮮李氏篡奪的史料考察，對照錢氏所經歷的南明王權之爭、亡國仕清的種種回憶與隱痛，由是將“以詩存史”、史家筆削的精神體現在《列朝詩集》及《小傳》之中，從這些隱微之處顯揚《列朝詩集》的詩學史意義。凡此，均有助我們重新審視詩學史或批評史等方面的研治角度和範圍。嚴先生這些細讀工夫和心思正好提醒我們，不應單純整合詩論家或詩學著述等的理論邏輯，建構有機的體系，還須仔細品讀該詩論家以至相關文士的詩詞文章。我們在其中多能發現與詩學理念相關的語詞，若不視其為冰冷的知識零什，而是以此出發，投以有情的目光與想象，透析和理解當中的生命語境及情感考慮，如此應能為文學批評的研究世界增添紛繁多姿的詮釋活力和氣象。

筆者眼界和識力有限，略申淺見，還請方家多加指正。

(作者：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許建業)